

【理论前沿】

新闻研究的情感转向:全球议题与在地议程

周睿鸣

【摘要】情感转向是当前全球新闻研究领域的前沿议题。在中国拓展这个全球议题应立足当前中国数字媒介兴盛的历史条件,以包括新闻从业者在内的多元新闻行动者为研究对象,从新闻的文本、组织和制度三个层面出发,结合特定语境分析新闻工作与情感,兼顾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基于特定情感结构相互影响和形塑的实践经验。开掘特定语境下情感结构的嬗变有助于理解在地新闻实践中的情感表达。在新闻研究情感转向的全球浪潮中明确在地议程,不仅对理解中国语境下的新闻工作与情感有益,还会为丰富全球议题的多样性作出理论贡献。

【关键词】情感转向;新闻工作;新闻研究;感动

【作者简介】周睿鸣,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原文出处】《新闻与传播研究》(京),2024.1.36~5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算法策展的新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CXW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媒介的勃兴,正视新闻文本中蕴藏的情感偏向、探查公众的情感结构与新闻的情感表达之间的互构关系,关注新闻人工作内外的情感劳动,已被新闻研究者纳入检视之中。数字信息技术的兴起凸显了新闻从业者在工作中对情感的日常使用,以及数字媒介中情感的日益动员、利用并使其资本化,使之得以持续^①。在充满情感的网络环境中,情感正在成为新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日益重要的动力。有研究者主张,要重新打量新闻从业者的情感以及游离于客观性之外的个人道德规范,关注他们的情感表达^②;在数字传播技术变革与新闻变迁的历史背景之下,要对受众进行更彻底的研究,并对传统的、建立在自由主义哲学当中的新闻中“理所当然”隐藏的权力进行更细致探究,从而把握当下情感驱动的新闻工作^③。这一较新的发展显示了过去十多年当中新闻研究领域对情感不断增长的兴趣,它使得对新闻生产、文本和受众参与的情感方面

的探查愈发多样^④。如潘蒂(Mervi Pantti)和瓦尔-乔根森(Kevin Wahl-Jorgensen)所言,有必要以语境相关(context-sensitive)的方式理解新闻工作中的情感;记者的情感工作是由行业变化和工作的具体环境决定的^⑤。这种方式不仅要承认情感是当代网络化、越发动态和不稳定的新闻工作的核心力量,而且应如科蒂索娃(Johana Kotisova)主张的那样,要将新闻工作中的情感概念化为由包括新闻工作、技术和媒体组织在内的、语境清晰的社会学相关现象,开展符合特定语境下新闻人的情感的社会特征的研究^⑥。

情感转向何以成为全球新闻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议题?如何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技术-社会互动中形成在地理解,以地方性的、对新闻工作与情感的讨论增进对全球议题的多样认识?这些问题有待解答。在数字媒介场景中,全球新闻业共同面临团结社群、凝聚公众、维系公共生活的规范目标。当欧美研究者试图将现当代新闻业与启蒙运动相勾连,审视被置入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被新闻业历史性排

斥的情感,回望近代以来的中国新闻实践,理性何以成为当然的、贯穿新闻实践的主要驱动力,情感是否成为新闻从业者不言自明、自然抑制的认知取向和策略式的表达策略?在梳理新闻研究情感转向的前沿之前,将首先回顾这一议程转换的历史缘起。论文将力图说明,情感转向与其说是一种研究的断裂,是欧美新闻研究者在对客观性这一主导新闻实践的操作准则和职业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反思基础上回应当前数字新闻实践新现象、新问题的理论梳理,不如看作新闻研究者维系其一以贯之的规范目标,守卫百年以来以新闻实践维系民主公共生活这个应然预设的阐释资源。接着,论文将阐述新闻研究情感转向对透视中国数字新闻实践的理论意义,勾勒拓展在地议程面临的特定历史语境,并指出在这一语境下分析新闻工作与情感面临的复杂现代秩序。最后,论文将从制度、组织、文本等多个层面示例,尝试给出事关中国新闻工作与情感的经验研究之进路。作为新闻研究情感转向展开的前提,这些预设需要释清,才能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开拓观照全球新闻研究情感转向的议程。

二、何以转向情感?新闻研究的断裂与延续

作为多种情绪过程中的一种,情感提供了摆脱狭隘的、个体式理解的途径,为理解身体层面的情绪提供了关系型解释与基于文化的叙事。情感扮演了维系社会交往的纽带的角色,为个体理解情绪提供超越个体的、潜在的政治化解释^①。简单说来,情感往往是集体乃至公共的,有其社会和文化的一面。提倡情感转向的瓦尔-乔根森认为,理解情感使研究者不仅要承认它在新闻工作中真实存在,而且要学会欣赏它的复杂性,把它视作社会行动者在公共空间中提出行动主张的一部分,寓于新闻实践中^②。

瓦尔-乔根森的话透露着欧美新闻实践中似成共识的价值理念,即现代新闻业长期闪耀理性光芒,新闻人普遍认为理性是推动公共生活的不二之选;情感对形塑这样的政治秩序几无建树,应当被遮蔽,自外于新闻工作。可以看到,提倡情感转向的研究者时常将客观性当作批判对象,为情感转向蓄积正当性;他们普遍在理性和情感的二元对立上论述“把

情感带回来”,将其拉回新闻研究视野^③。回顾新闻研究的历程,客观性并非当下才面临诘问,对它的批判实有历史回声,以情感挑战理性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争论中亦不绝于耳。在对客观性等新闻实践原则和价值理念的历史反思中寻找情感转向的缘起,是理解这一全球议题的必要前提。

(一)情感转向:解释数字新闻正当性的话语资源

尽管客观性在绵延百余年的现代新闻业中一直被普遍视作新闻业的核心价值,但它的登堂入室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酝酿,伴随了新闻这一职业的兴起^④;与其说客观性彰显了对事实的信任,不如说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新闻从业者怀疑人性、传统价值和知识获取的公众准备了一套方法。秉持建构主义视角、被誉为第一波新闻编辑部研究的媒介社会学成果认为,包括客观性在内的新闻业规范信条实为新闻从业者围绕其生产活动建构的意义体系与职业文化^⑤。可以说,客观性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标准,而是新闻业在充满压力、制约和障碍的世界里维系公共生活的展现价值的历史表演(performance)^⑥,不论秉承信息导向还是诠释导向,诉诸理性还是情感,它们都是在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中正当化新闻这一体裁、以制度化的职业活动维系公共生活的话语资源。

情感一直是新闻工作的一部分,它从未在新闻工作中退场,只不过被新闻从业者当作以与客观性同样的策略仪式,制度化、系统化地在报道中嵌入,并作为隐性知识深潜在新闻工作中^⑦。情感能否、如何成为新闻人维系公共生活的利器一直是新闻研究者讨论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新闻业开始以更为开放的姿态拥抱情感:重视个性化的情感表达,重视记者的情感表达,允许比从前更广泛的情感展示^⑧。那时,许多与新闻业相关的传统二分法(如硬/软新闻、事实/观点、信息/娱乐)正逐渐模糊。彼得斯(Chris Peters)回顾相关研究后发现,大多数形式的公共话语都在努力避免正式和距离感,这些曾是言说公共的重要标志^⑨。世纪之交,尽管新闻和娱乐之间的模糊界限激起了学界关注^⑩,但拒绝对职业标准的侵蚀、谴责以煽情迎合大众仍然是学界两界的主流看法^⑪。

如果说20世纪后半程的地缘政治、社会变迁和

媒介技术的发展为诠释导向型新闻创造了生长的土壤,为反思客观性提供了可观的空间,却不足以撼动客观性作为新闻业的主导价值理念和操作标准,那么,在逐步浮现的数字媒介生态当中,数字技术的广泛赋权已模糊了新闻业的内外边界^⑧。表面上看,数字媒介场景中的新闻业面临着吸纳开放、透明、互动的全新理念^⑨,或者如沃德(Stephen Ward)所说的那样要在数字媒介当中重写客观性^⑩。实际上如卡尔森(Matt Carlson)整饬出一套符合数字媒介生态的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那样,通过重新定义新闻和新闻活动寻回自身的正当性^⑪。在数字新闻中调用的情感便是新闻人以新闻之名观照公共利益、回应公众关切、维系公共生活征召的历史性话语资源,它助推新闻人重新审视客观性的内在张力,超越理性与情感的朴素二分,体会在数字媒介条件下接近新闻业规范目标的复杂性。

虽然新兴的数字新闻产品偏离了既往的客观性规范,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还是在更广泛的新闻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⑫。一系列变化包括:作品和第一人称的真实生活故事变得越来越多——要么是主人公自己写的,要么是“告诉”记者的;专题报道变得更具私人化和告解色彩^⑬。包括播客在内的更私密的音频故事形式的兴起扩大了记者自传式叙述的空间,助推了上述变化^⑭。这折射了围绕亲密关系在公共话语中的作用的广泛讨论^⑮:瓦尔-乔根森认为,使用这种亲密的讲故事的方式往往有助于建立故事讲述者的真实性,使记者或他们的对象在本质上值得信任^⑯。许多新闻产品采用了讽刺作家科伯特(Stephen Colbert)所说的真实性风格,这种风格及其内蕴的语气的在试图产生确定性、忠实性和信任方面变得更为重要。这不仅与新闻替代品的激增相吻合,而且与“有效”新闻风格的增加相吻合^⑰。新闻中的情感参与特征越来越明显:这种容易观察到的转变标志着从20世纪传统的新闻中立性和疏离性的关注点的改变^⑱。

相应地,新闻研究者重新打开曾被化约为非主流乃至坏新闻代表的若干概念,例如丹尼斯(James Dennis)同他的合作者一道分析了英国的 BuzzFeed

News和Vice News,探讨它们如何在大选报道中使用情感故事。他们发现,BuzzFeed和Vice利用情感语言来吸引年轻受众并与他们建立联系,同时为传达复杂的政治内容提供了途径;两家机构在报道中都拥抱网络文化,借鉴了社交媒体上主观、自白和个性化的表达形式。两位作者认为,与其将这些内容视为信息娱乐,不如将新闻的非正规化视为通向严肃政治报道的大门,从而重新调整政治新闻长期以来形成的范式^⑲。类似地,奥托(Lukas Otto)等人试图将煽情主义、软硬新闻、信息娱乐化和小报化加以区分,通过“软化”这个元概念和建立的多层次框架模型避免将与上述概念相关的不同形式、主题和特征混为一谈^⑳。可以说,新闻业拥抱情感不应被简单理解为超越理性/情感的二元对立,而是要置入当代新闻业变迁当中,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的崛起,精英主导并设置议程、凭大众媒体的工业化生产支撑的新闻业作为社会公共部件这一规范角色的衰退当中。新闻业在当下拥抱情感,实际上是要成为新兴的、情感导向的媒体生态系统中有意义、有见地、值得信赖的一部分,与当今的“情动公众”(affective publics)建立连接,在连接中安放新闻业的核心功能,实现新闻业一如既往维系公共生活的规范目标^㉑。情感转向就是新闻研究者在数字媒介勃兴的当下重新寻回情感,探寻情感作为解释新闻活动正当性话语资源的可能的尝试。

(二)情感转向的研究维度

瓦尔-乔根森在2021年的一份述评中指出,新闻研究的情感转向体现在新闻生产、文本和受众参与的诸多方面:(1)从业者日常工作中的情感劳动,包括在职业生涯中积累情感压力和形态改变的方式,这些动态如何折射新闻业在数字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变动;(2)新闻文本潜藏的情感成分,例如特定的新闻篇目如何反映情感这一策略仪式被代入到制成的作品当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境、不同的新闻文化之间有何区别;(3)情感与新闻受众,一方面关注新闻文本中显影的情感源自什么样的受众的情感结构,一方面探讨新闻故事如何具备亲和力,能够召唤受众参与到情感叙述当中。类似地,在合作架构的、讨论

新闻业与情感的学术特刊中,潘蒂和瓦尔-乔根森提到,必须将新闻业理解为被多方面情感工作深刻塑造的职业和实践。在新闻生产常规当中,大量的、基本不被承认的情感工作在幕后和台面之下进行。它至少有两种具体方式,首先体现在指定职业客观性的要求上,其次体现在管理与消息来源的互动上。换句话说,如果记者选择将情感融入他们的新闻故事,那么记者需要处理如何在新闻叙事中正确、公开地展示情感,此外还要在与消息来源的互动中开展大量的情感工作^⑧。

总体上讲,当前关于情感转向的新闻研究可以归纳成两个主要议题和两种取向:一是情感与公共表达。情感是传播实践中难以回避的组成成分和表达方式,新闻是公共生活的关键部件;情感转向以新闻工作为核心,关注特定时空条件之下公众表达蕴藏的情感结构,探查新闻从业者如何日积月累地形塑公众情感结构,以及这一情感结构如何反过来塑成新闻从业者观察和审视社会的观念体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新闻价值的感知和判断。借用巴巴利特(Jack M.Barbelet)的话,这一议题不只承认情感的文化面向,还关注情感的非文化基础,将其视作社会过程的结果,放回到触发情感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当中去理解^⑨。简单说,在情感转向中关注情感与公共表达,核心就是在社会结构当中探寻新闻从业者的观念体系如何通过新闻工作与公众情感互构。二是新闻从业者的情感劳动。这一议题旨在开掘曾被既往研究遮蔽的部分,认可新闻从业者在客观性原则约束内外蓄积和迂回表达情感的合理性,依托诸如灾难报道等特定议题类别从文本层面观察从业者如何策略性书写情感,从业者在长期的情感收敛过程中的群体心理变化,以及诸如主观性如何在从业者承受源自新闻组织的客观性约束和压力时经年累月走入新闻实践,逐渐改变新闻文化和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形态。

为了研究新闻媒体如何为情感公共领域做贡献,如何促进公众参与和社会团结发展所需的适当情感,情感如何在从业者肩负的客观性期望中运作,研究者们征用了一些社会学(包括一些具有社会学

意蕴的)理论资源。例如情感劳动:这是情感社会学领域的核心概念。霍奇查尔德(Arlie R.Hochschild)把情感劳动视作满足组织目标和行业要求的方式,当员工为了组织利益和社会规范在特定的情况下压制、过度发挥、推迟或沉默自己的情绪时,他们就会进行情感劳动,为薪水约束情感^⑩。在霍奇查尔德的研究中,情感劳动是工作的一个剥削性方面,能导致异化和疲劳。潘蒂指出,围绕新闻的情感工作超出了霍奇查尔德原初定义的情感劳动的范畴,因此她们把情感工作作为一般术语,囊括一系列与情感有关的实践^⑪。另一例是理查兹(Barry Richards)关于情感公共领域和情感治理的探讨。他提出,情感公共领域是对政策辩论和价值争论的“公共领域”永远存在的情感伴随;尽管它常常被忽视,但情感公共领域在决定政治事件方面可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他以英国为例指出,随着英国政治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的减少,情感公共领域的重要性随之增加:政治家的个性和个人存在有了更多空间,更需要“情感治理”——审慎关注公众的情感动态。政治领导人在这种公共情感管理中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但媒体,尤其是记者,能够而且确实在确定公共领域的情感基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⑫。理查兹采取规范性的立场,认为记者应该积极管理公共情感,以便更好地促进公共生活。这样的立场不容易符合新闻业的理想价值和专业的自我形象,或者说不落在传统上强调新闻实践的理性和信息层面^⑬,但这是在当下新闻变迁中重新塑造新闻业在情感公共领域的地位的尝试。

全球风行的新闻研究情感转向为切入中国语境、发展在地议程提供了初步知识地图。既往研究预示,关注新闻工作与情感面临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不同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环境,以及数字传播技术同社会互动产生的不同数字媒介生态。情感转向能否、如何成为中国语境下在地新闻研究的理论资源,蓄积新闻研究知识生产的理论潜力?

三、发展在地议程:情感转向的两个局限

无论上述研究者对新闻业的历史变迁给出什么样的规范评价,这些评价均建立在现当代新闻业作

为社会公共部件的稳定历史前提之上。这意味着新闻业的职业运作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自主性。研究者的评述折射着启蒙时期以降的、笛卡尔式的理性^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们寄望的未来,不管对客观性原则持何种态度,这种坚固的理性深植于历史当中,夯实了新闻业并烛照了它的行进。与其说以国家甚至所谓东西之分的世界阵营为单位,生造出一种本质化地阐述中国特色的新闻工作与情感的图景,不如说启发研究者去关注,中国语境下的情感如何从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技术-社会互动中生发出来,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式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加诸新闻工作之上,与新闻从业者的实践活动相互形塑。若在中国语境下谈论新闻研究的情感转向,必须讨论的是欧美研究者的普遍论述当中存在的两个局限:一是理性/情感简单二分的局限,二是以职业视角打量情感与新闻工作的局限。

(一)理性/情感二分的局限

关注情感转向的新闻研究者主张“把情感带回来”,把从未同实践活动相剥离的情感带回到研究视野之中。但情感在新闻研究议程中的离场并不意味着其与新闻工作相剥离,不意味着情感在客观性原则的抑制下全然成为新闻从业者策略而迂回表达的对象。如果说情感转向在西方意味着承认启蒙运动以降的理性、经验和实证精神在新闻场域中暴露了自身的历史局限,那么在中国语境下,情感转向提醒的则是作为西学东渐之舶来品的理性、经验和实证精神并未成为形塑新闻从业者实践理念的、整合的认识论基础,理性和情感一直以一种碎片式的、相互交织的方式,在新闻从业者的认识论当中斑驳显影。因此不能预设,新闻从业者普遍接受了理性对情感的全然制约;对新闻从业者来说,情感也许并不是同客观性原则互斥的成分。

金观涛、刘青峰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性精神不同于西方理性,可称为常识理性。对比宋明理学和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可以看到,无论合理性最终标准还是论证结构,两者均存在差异:首先,西方理性主义合理性标准强调形式法规、法律和计算,而宋

明理学注重常识和人之常情为合理;前者意味着用科学定律解释自然现象、改造世界以及法治、科层组织的建立,后者注重教化天下。其次,西方理性主义对于基督教终极关怀只具有工具意义,合理化导致工具理性的扩张;中国合理性终极标准虽然也属形而上学层面,但它是道德的基础,始终同作为终极关怀的道德紧密相连。第三,从合理性论证过程看,西方理性化意味着二元论理性主义成为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是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中国文化的理性化则与现代化没有直接关联,但始终是重构道德意识形态的深层动力^⑨。以此观之,中国新闻从业者面对客观性原则这一西方舶来品的时候自会望文生义,借用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说法,在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实证科学和法治秩序加以选择性吸收和学习的同时,糅合富有中国传统的“理”的观念,成为在新闻实践中理解何为理性客观的复杂思想基础。由此也不难理解,中国的新闻实践不似西方同业那样在理性-情感二分中倒向前者,而是在富有本土意蕴的情理融汇当中格物致知,把求真与道德高扬统一起来。

中国语境下新闻工作中的情理交汇、情感与事实的非互斥关系有着丰厚的历史渊源。回看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维新派到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再到中国共产党把党报视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武器,情感从来不被格物致知、叩问事理逼退到历史帷幕之后,而一直是革故鼎新的政治力量在历史舞台上宣传政治主张、教育和动员人民群众投身革命活动的关键元素^⑩。伴随现代新闻业在近现代中国的发端和拓展,新闻实践中的情感表达折射出新闻从业者极富中国在地特征的一面:他们或多或少乃至深受儒家学说等思想的影响,视自身为传统知识分子社群一员,将新闻活动视作文人论政、书生报国的良机^⑪。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情感以有别于西方同业的方式渗入中国的新闻实践。即便在当代中国,不论是20世纪80-90年代风行的报告文学,还是《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南方周末》特稿等文学新闻栏目和体裁,包括它们记录的典型人物、反映的热点事件,无不向读者观众传递着可与

之同频共振的感动、愤怒、同情、恐惧等情感。情感的显影不仅意味着它在新闻实践中的表达被纳入常规,而且说明在客观报道的话语之下,从业者眼中的新闻业总是要担负推动国家发展、民族强盛、社会进步的道德责任,而这与既有研究勾勒的理想化的、自主的新闻工作不能完全相容。

当下,数字新闻报道当中易于识别的情感偏向也许不是纯粹的技术作祟,而是那从未退场、如影随形的情感在特定社会的新闻文化中绵延的历史结果。把数字新闻中流淌的情感径直断定为数字传播技术和数字媒介发展中的时代新症,无疑是对“房间里的大象”——长期形塑新闻中的情感的历史语境视而不见。在历经数十年的大众媒体商业化、集团化发展之后,在客观性原则随着大众媒体日复一日的运作被广泛接纳之后,在科学和经验主义认识论成为越来越多的网络用户理解生活世界的透镜之后,新闻研究的情感转向提供了新的机会——随着受众的分化,经由媒体输出的情感表达不再被受众熟视无睹;新闻中的情感不但会被网络用户品评,有时甚至会引发不小的争议。对当下数字新闻中彰显的情感,仅仅叩问数字媒介的技术特征是不够的;唯有回望历史、挖掘历史语境如何长久地塑造了新闻中的情感,才能有效解释当下数字新闻中的情感。

(二)职业视角的局限

新闻业是“非封闭的专业”(uninsulated profession)^⑧。它缺乏深奥的知识、专门的语言和正式的认证(这些保护医生和律师不受普通公众影响)。尽管新闻业远不能在专业化程度上与上述世所公认的行当相提并论,但是,这不妨碍以职业社会学眼光打量这一现代社会的分工领域,以职业管辖权、边界工作等概念考察新闻从业者与其他社群围绕新闻工作的话语争夺。

不过,以职业社会学解读中国新闻业不免乏力。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觅得专业化发展的历史足迹,但是,遵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方针指引,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新闻工作,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这是中国新闻业地处特定媒介体制的现实条件。当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化之路呈现为一个碎

片、局域的进程,它也展示了行业内外的社会精英如何理解新闻业与体制和资本等关键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正是这些关键社会力量的不断推拉形成了中国新闻业的历史图景^⑧。

数字传播技术变革之下,新闻从业者这一社群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数字媒介(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冲击下,新闻业面临技术和商业上的危机已是人所共知。以共享的职业理念、对民主公共生活的笃信和坚持作为重振新闻业这一公共部件的话语资源,这一观点已不鲜见。如果把这一观点拉到中国语境下,一旦新闻从业者社群没有稳定、可预期的、充分的职业化,谈论客观性原则乃至理性主义对新闻从业者认识论的长期遮蔽就失去了预设的前提。危机之中,特定语境下新闻从业者社群的有限职业化反倒可能成为与研究规范期望相左的催化剂,加剧新闻从业者在稀薄职业共识基础上的理念分化。上文谈到,新闻研究情感转向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呈现两个主要议题,其中之一是新闻从业者的情感劳动。但是,径直在中国语境下探讨新闻从业者的情感劳动同样是奢谈,因为大众媒介当道时中国新闻从业者如何像欧美同业那样将工作中激发的情绪收敛到新闻工作之外,这一点尚待详细考察,遑论数字媒介兴盛时期,那些游离在新闻单位之外的新闻行动者对情感劳动如何开展的看法与新闻单位的员工不尽相同。

新闻研究情感转向在中国语境下暴露的二重局限是全球性研究议题在富有在地特征的现代秩序中水土不服。批判审视全球范围内新闻研究的情感转向,就是留意当下数字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中包含的现代性的折叠,正视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的两面:一面是启蒙以降的现代秩序在西方渐次展开,通过近代以来的中西碰撞和交融进入中国,成为中国新闻从业者在内的各个社群的思想源泉;一面是源自中国悠久历史传统,至今仍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形塑我们对情与理的本土理解的知识动力。

论文主张,新闻研究情感转向的在地议程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出发。所谓时间大体上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新闻业变迁分为两个阶段:大众媒介

时期和数字媒介时期。如此划分旨在回到近现代基于大众传播模式发端的中国新闻业发展史当中,寻找新闻活动当中非情理二分的情感表达,在此基础上形成探寻数字传播生态当中新闻与情感问题的话语资源。如此划分还凸显了数字媒介时期遍布体制内外的多元新闻行动者对塑造公众的情感结构和社会情感气候的潜在贡献,这与大众媒介时期仅由新闻机构当中的从业者扮演上述角色截然不同。所谓空间指的是超越中观组织层面,拓展新闻组织、新闻从业者和受众以外的研究对象,把微观层面的新闻文本、中观层面的新闻组织和新闻行动者社群及指向宏观的新闻与媒介制度整合起来。这一设计考虑的是媒介体制的不同——不论是大众媒介时期的媒介体制还是形塑当中的数字媒介体制,地处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当中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技术-社会互动都与新闻与情感这个研究议题相互交织。综合时空两个维度,研究者可以结合中国的新闻实践提出一系列有关新闻与情感的研究问题。

四、情感转向的在地议程:以感动为例

情感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多种进路。雷迪(William M.Reddy)曾梳理情感研究的历史。他发现,除了人类学家,其它学科的情感研究者常常忽视他们工作的政治意义;人类学家是个特例,但对陷入种族中心主义的担心、对文化概念的持续批评阻碍他们取得研究进展,并让情感人类学家分成两个流派;在如何定位历史变化的问题上,情感人类学也显得滞后。雷迪据此提出,情感表达可以被认作一种话语,意在简略描述正在呈现的、被激活的,但在当前注意力所及范围之外的思想材料^④。怨恨、嫉妒、同情、愤怒、焦虑、恐惧,这些情感风格都曾被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⑤,而感动却鲜受关注。

尽管感动是一种可被私享的情感风格,但更多时候,它被特定社群乃至更广泛的公众共享。天有不测、灾害降临,我们为团结一心、守望相助而感动^⑥;外敌入侵、战争到来,我们为同仇敌忾、御敌于外而感动^⑦;体育健儿奋勇争先、问鼎桂冠,我们为其骄人战绩与有荣焉而感动^⑧;航天英雄宇宙探险、求索太空,我们为其无畏壮举、为国力强盛而感动^⑨。

除了足以撼动全国乃至全球秩序、有分量彪炳史册的关键公共事件,我们还会被凡人善举感动^⑩。普通人奋不顾身,徒手接住高空坠落的幼龄孩童,我们感动,美誉其为“最美妈妈”;消防员明知生命危险,仍义无反顾冲进火海拯救生命,我们感动,盛赞这是“最美逆行”。感动无处不在,让人“泪目”^⑪,传递“正能量”^⑫,是一种为中国人熟悉的情感风格。很难想象,如果少了媒介的塑造,感动将如何被感知和体察。

有趣的是,虽然不难在新闻媒体上找到刊发的文章、播出的节目乃至发布的数字应用程序,轻松地识别其中事关感动的段落、词句和细节,但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显示,塑造感动似乎被习以为常地认作新闻从业者的分内之事。除了偶有解读新闻篇目和节目借解读制造媒介仪式^⑬,凝聚国家、社会和文化认同^⑭,这些研究多着墨于塑造典型人物和事件的报道策划过程和叙事策略,重在引介新闻“如何感动”^⑮。对研究者来说,在新闻中堆积感动的正当性不言自明;作为一种可被公众同享的情感,感动与宣称客观报道的新闻工作似乎并行不悖。然而,研究者对包括感动在内的情感熟视无睹的取态,将其自然而然内化到新闻工作中的取态,给研究新闻工作带去了无意识的遮蔽。这种遮蔽形同规范预设,想当然地设定新闻从业者承袭了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融汇情理的实践观念。举个例子:科学记者可能为中国科学家取得的世界级科研成果而在新闻中书写感动;不论被建构为一国之荣还是世界之福,记者都可以在报道中灌注感动。然而如果科学记者认为这是人类在科学进步上取得的纯粹贡献,恐怕感动和记者的零度书写就是绝缘的。结合这个例子回看当前的研究成果,也许研究者对冠以感动之名的节目关注太多,对普遍渗入了感动的更广泛的报道关注得少。此外,既有研究对商业网站、社交网络和媒体平台上流淌的情感几无关注,也就无从谈起在数字媒介上流传的新闻如何建构着与传统媒体同中有异的情感。这在数字媒介当道的时下构成了一个事关新闻与感动的研究盲区。

立足中国新闻实践、将新闻研究转向情感不是

简单地接轨,而是在研究者社群呼吁“把情感带回来”时指出“情感从未离场”,分享一套富有中国乃至亚洲在地特色的在地议程。这也是解除在地研究者对这一议题的长期遮蔽的机会,拷问经新闻生产凝结到新闻文本、传递出的情感有什么历史源流^⑥,数字传播技术和数字媒介如何为激活数字新闻中的情感表达创造空间,进而重思新闻工作中习以为常的情感对形塑社会心态、影响公共表达、凝聚社会共识等事关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做了什么。具体来说,可以从文本、组织和制度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文本层面

中国的报纸早已在版面上为感动着墨。慧科搜索数据显示,1990-1994年,标题和内文包含“感动”的文章仅有数篇;1995-1999年,上述搜索条件之下的文章增至400余篇。进入新世纪,标题和内文包含“感动”的文章每年都有万余篇。中国知网重要报纸数据库也大致呈现了这样的搜索结果趋势,即2000年以后上述搜索条件之下的结果明显攀升。除了上述数据库在新世纪前后收录报纸数量存在巨大变化这一可能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媒体的商业化、集团化改革给新闻组织创造了书写感动的话语空间;彼时的政治经济结构支撑了上述商业化、集团化改革,也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无声地塑造着社会心态和可被共享的情感结构。这样的情感结构成为新闻从业者书写情感时汲取的话语资源,从业者对这套话语的再生产亦凝结在新闻文本当中。以“感动”为关键词,一系列研究问题由此待解: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传媒商业化、集团化改革发展过程中,新闻报道如何折射感动这一情感风格——感动怎样纳入了报道框架,是否存在新闻从业者围绕感动而成的话语。当广泛存在于新闻报道当中的感动框架和感动话语被指出的时候,研究者便可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如何在情理交织的公共空间中抽取同享的情感结构,于报道中再现、再生产这样的情感结构,继续给公众消费。

感动不是孤零零从天而降。大众媒介兴盛时期

流淌在报道中的感动一方面等待研究者寻觅“承前”线索,到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成长历程中追根溯源,一方面需要研究者关注“启后”信号,观察社交、算法和其他智能导向的数字媒介兴起后,感动这一情感风格如何寓于新闻文本(包括非新闻单位生产的,往往被称为“互联网内容”但明确关注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新闻文本)当中。研究者可以钻进中国新闻史的故纸堆,到中国近现代重要报纸和特定主题、人物和事件报道中寻觅感动的踪迹,也可以到移动新闻客户端、社交网络和媒体平台等数字新闻终端中监测、收集、抓取报道和记录感动的各类新闻文本。

除了“感动”,与之共现的关键词都可以成为描述和诠释有关感动的报道框架和话语的重要语汇,例如时下人所共知的“正能量”、“泪目”、“最美逆行”等等,皆是数字新闻篇目中用来表达感动的关键词。不论“承前”还是“启后”,目的都是通过新闻文本洞察新闻工作如何与公共空间中的感动相互形构,寻找在新闻中书写感动的历史惯性、绵延至今的情理交融的社会心态,同时指出与社会深度互动的数字媒介如何承续或打破历史上的情感结构,为包括新闻从业者在内的多重新闻行动者提供了在新闻中多样地表达感动的多重可能。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同互联网原生媒体相对应的传统媒体,经历数字化改造的新闻单位会否在不断变化的数字媒介生态中调适其事关情感的叙事风格;如果可以捕捉到这样的历时性变化,那么又如何从媒介生态的变迁中寻找解释因素?研究者可以从新闻文本出发,就特定新闻单位的一个或多个给予案例分析,以叙事风格可能的转换折射媒介生态、新闻业变迁和社会情感结构的交光互影。

(二)组织层面

从中观层面的组织出发是考察新闻工作与情感的核心视角。采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走入新闻组织、接近制造感动的新闻从业者,秉持这一视角的研究比聚焦新闻文本坐拥更多优势,以质性的方法助力研究者描述富含感动的新闻被生产出来的过程,解释其生产机制,并结合生产活动立足的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给出意义诠释。

从《感动中国》说开去。作为一档由央视新闻部门主导的、按年更新的专题节目,2003年,《感动中国》在中国传媒商业化、集团化改革的浪潮中肇始。走过二十年历程后,它所处的传播生态已由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介统摄、新闻从业者主导让位于以移动终端为主的数字媒介为载体、社交和算法等逻辑支撑的分众与个性化主导。从前,新闻从业者以组织为单元形塑自身的实践观念体系。他们把经验主义认识论与格物致知熔于一炉,将科学实证地观测外部世界和知识分子“书生报国”的历史传统相交汇,划定客观和主观的边界,形成他们对情与理的取态。在制订媒介议程的渠道垄断之下,感动被容纳到从业者的实践观念当中。新闻从业者据此制订报道感动的生产常规,确定制造感动的节奏,决定采集感动的空间范围。感动经新闻再现到公共空间,起到凝聚和团结社会之效;作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组成部分,感动还是新闻单位参与情感治理的重要工具。

在数字媒介生态中,新闻从业者从前以组织为单元束缚而成的、容纳感动的一套实践观念在新的传播生态中难以被所有新闻行动者共享,甚至连从业者内部亦无法调适。新闻的生产/生成主体与消费主体同样有可能围绕特定的热点事件,围绕新闻能否容纳感动、以何种实践理念报道感动、呈现感动的策略开展密集激烈的攻防,推拉数字新闻实践中如何正当再现感动的边界。一档常年播送的节目提供了在新闻变迁中观察实践活动和感动塑造的历时性契机。问题包括:作为新闻单位制作的电视节目,新闻从业者如何把职业社群事关感动的理念凝结到组织实践当中;随着数字媒介的崛起,围绕节目展开的受众互动如何增强,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上的新闻行动者如何扭曲、再造从业者业已输出的节目主题,甚至形成挑战、消解原初节目的反感动框架,新闻从业者如何与其互动,如何在开放、即时的数字传播生态中应对上述竞争性叙事,通过什么平台分发、凭借什么样的叙事策略与其他新闻行动者展开竞争或协作。这其实探索的是,伴随着媒体平台的兴盛,社交、算法和智能逻辑对个体、分众式媒

介消费的深化,以及视觉导向的短视频、数据可视化、虚拟现实等叙事模式的流行,不同的新闻行动者如何重思支撑感动制造的话语成分^⑥。

(三)制度层面

制度研究处于观和宏观层面之间,关注政治—经济结构如何提供开展正当化组织活动的资源。这些条件为新闻单位提供历史的路径依赖,也为数字媒介中游离于正式制度外的新闻行动者提供理性计算的空间。简言之,从制度层面出发考察新闻工作中的感动需要研究者关注的是,建立在大众传播模式之上的新闻业如何坐拥了在实践活动中表达情感的正当性。随着新闻业的数字化变迁,新闻单位如何在制度性话语资源中抽取、变造,在正在形塑的数字媒介体制中继续保有其作为社会公共部件的正当性。研究者亦应留意那些游走在数字媒介制度边缘的数字新闻行动者,探索它们如何在制度的模糊空间中生产/生成新闻,制造感动。

试举两例。包括感动这一情感风格在内,新闻单位制造的、浸润着情感的文本有时会被指摘为“报道不客观”。如果以纯粹的客观报道原则审视这样的文本,或者说以情理截然二分的原则审视这样的新闻,那么,得出上述结论似乎自然而然。然而,这样的指摘容易走入怪圈,即“不客观的报道”非新闻从业者所愿,是新闻组织乃至外部力量所为。往往以宣传二字粗暴代之的上述指摘遮蔽的问题是,新闻组织有在实践活动中表达包括感动在内的各种情感的内在冲动和惯性。这种冲动和惯性可能源自组织中人对外部制约的创造性理解和临场发挥,也可能源自从业者对历史积淀的、对在中国应当如何做新闻的功能和角色的长久理解。若要以感动切入新闻工作,研究者从制度层面可以拷问的是,新闻组织制造感动的功能是如何被从业者内化到组织运作的制度中去的——不论从业者撰写的是不是“命题作文”,对于他们而言,以“共情”代替“理性”,以舆论引导超越客观中立,以主观介入、感化和营造团结为己任,这些情感导向的实践理念如何被知识分子“书生报国”的一面驱动,被建立现代化国家的朴素民族主义驱动,被路见不平、行侠仗义等中国历史传统中的

情感成分驱动。这些情感成分既在从业者实践理念中,又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新闻实践中广泛运作,为当代新闻组织的常规运作提供了富有历史惯性的正当化话语资源。

另一重可被关注的空间是数字媒介生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交网络和短视频媒体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事关感动的新闻不胜枚举,但由何种新闻行动者制造、事关什么议题的感动可以在其中畅行无阻,什么样的感动会以什么样的理由和名义被禁止流通,这个疑问尚无回答。它既涉及网信和网络视听内容主管部门对社交媒体和媒体平台的治理政策,特别是涉及感动这一情感表达的常规和专项治理政策;又关系到社交网络和短视频媒体平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订的自律公约与条款,以及网络和平台社区委员会依据自律公约和条款开展自我约束的裁定过程。研究者可收集、聚焦上述议题相关的经验材料,通过这些材料把握数字媒介中的新闻行动者制造感动的制度边界。与大众媒体时期新闻单位面临的媒介制度不同,数字媒介中附着在新闻中的感动生产面临的制度边界更为不确定。因此,上述考察的意义不止于描述制度边界本身,更重在勾画作为数字媒介的社交网络和媒体平台与监管方对制度边界的动态形塑。

五、结语

论文梳理了近年来新闻研究情感转向这个前沿议题。当建立在大众媒介基础上的当代新闻业面临技术和商业等多面危机时,新闻研究的情感转向并非制造了一场历史的断裂。它看起来给予客观性强力一击,思考情感在团结和凝聚数字时代的公众的潜能;实际上,研究者对客观性规范这一历史建构的批判和反思从未中止,情感是研究者在数字媒介场景中寻找新闻活动历史正当性调用的话语资源。在此背景下,立足数字媒介生态的新闻研究者对从业者因职业和组织约束(包括自我约束)策略地潜藏在新闻工作内外的情感重新给予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新闻业拥抱情感初露端倪之后四十余年,媒介变迁行以至数字化、网络化、个体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今时今日,新闻研究者借助包括情感社会学在内

的诸多理论资源,以情感公共领域、情感治理、情感劳动等概念关注新闻工作中的情感问题,试图在数字媒介勃兴而新闻业进入历史低潮,政治极化、社群分裂,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封闭、区隔乃至仇恨不断蔓延的当下,呼唤以新闻工作维系民主的公共生活的规范,修补社群裂痕、促进公众团结、提升政治参与的效能。

论文梳理新闻研究情感转向的主要目标是开拓立足于中国语境的在地议程。论文注意到,对欧美新闻研究者来说,客观性规范蕴藏着理性和情感的二元对立,即新闻工作历史性地以理性驱动、驱离情感。尽管欧美新闻研究者主张“把情感带回来”,但在非西方的新闻工作中,情感可能从未离场。论文认为,应超越欧美研究者的二重局限,一是理性和情感截然二分的局限,二是以职业视角透视情感与新闻工作的局限。具体到中国,参悟新闻工作中的情理交汇、情感与事实的非互斥关系,把握数字传播技术变革对一个未曾经历完整职业化过程的从业者社群可能造成的冲击与加速分化,是接入在地新闻工作与情感问题的关键。论文进一步拓展了在中国开展新闻研究情感转向议程的时空维度:首先将近代以来的中国新闻业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大众媒介时期和数字媒介时期,试图在发端于大众传播模式的近现代新闻业中寻找情感表达的历史传统,为探寻数字传播生态中多元新闻行动者开展的情感表达提供话语资源。两阶段考察应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展开,把新闻文本、新闻组织和新闻行动者社群以及指向宏观的新闻与媒介制度整合起来,给予经验考察。论文还以感动为例具体说明了如何拓展在地情感转向的研究议程。

对研究者来说,与全球同行共享一个前沿议题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无需多言。然而论文认为,尽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境中关注新闻研究情感转向的呼吁不绝于耳,但是,对普遍通行的议程保持反思的自觉,在此基础上制订异中求同的在地议程至关重要。欧美新闻研究者呼吁“把情感带回来”、把情感纳入研究视野,是在新闻业以理性团结公众显露疲态时找到的一味解药,还是会将研究者试图重建

的公共生活进一步带入深渊?当数字媒介中的多元新闻行动者对如何在新闻实践中表达情感莫衷一是,中国的新闻研究者能否打破对“从未离场”的情感的情感熟视无睹,正视新闻生产和生成中的情感表达这一双刃剑?随着近现代中国的沧桑巨变,科学技术作为舶来品学以致用,实现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飞跃。在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情感与理性的助推错综复杂。如何从数字新闻出发,在当下评估新闻中的情感对社群共识、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的复杂作用?如此方能形成新闻研究情感转向的普遍观照意义,以地方性知识增进全球新闻研究者对同一议题的多面理解。

推进中国新闻研究情感转向的在地议程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些驱动中国新闻从业者(包括数字媒介中的新闻行动者)、萦绕在新闻工作中挥之不去的情感,长期以来缺乏学理论述,增加了被化约和误读的可能。在欧美新闻研究者历史性地重视新闻工作中的情感的时刻,抓住这个在同一议题和相关概念上对话的空间,发掘在新闻与情感表达等议题在现代后发国家、东亚等特定区域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普遍性,有助于融通中外,以新闻研究展示中国新闻工作和互联网发展的复杂性。

注释:

① Wahl-Jorgensen, K. "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Studies?" *Digital Journalism*, vol. 8, no. 2, 2020, pp. 175-194.

② Pantti, M. "The Value of Emotion: An Examination of Television Journalists' Notions on Emotion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5, no. 2, 2010, pp. 168-181; Stupart, R. "Tired, Hungry, and on Deadline: Affect and Emotion in the Practice of Conflict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vol. 22, no. 12, 2021, pp. 1574-1589; Wahl-Jorgensen, K. "The 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 A Case Study of Pulitzer Prize-winning Articles," *Journalism*, vol. 14, no. 1, 2013, pp. 129-145.

③ Lecheler, S. "The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Needs to be About Audience Perceptions," *Digital Journalism*, vol. 8, no. 2, 2020, pp. 287-291; Orgeret, K. S. "Discussing Emotions in Digital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vol. 8, no. 2, 2020, pp. 292-297.

④ Wahl-Jorgensen, K., & Pantti, M., "Introduction: The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vol. 22, no. 5, 2021, pp. 1147-1154.

⑤ Pantti, M., & Wahl-Jorgensen, K., "Journalism and Emotional Work," *Journalism Studies*, vol. 22, no. 12, 2021, pp. 1567-1573.

⑥ Kotisova, J., "The Elephant in the Newsroom: Current Research on Journalism and Emotion," *Sociology Compass*, vol. 13, no. 5, 2019, p. e12677.

⑦ Kotisova, J., "The Elephant in the Newsroom: Current Research on Journalism and Emotion," *Sociology Compass*, vol. 13, no. 5, 2019, p. e12677; Wahl-Jorgensen, K., "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Studies?" *Digital Journalism*, vol. 8, no. 2, 2020, pp. 175-194.

⑧ Wahl-Jorgensen, K., "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Studies?" *Digital Journalism*, vol. 8, no. 2, 2020, pp. 175-194.

⑨ Blaagaard, B. B., "Shifting Boundaries: Objectivity, Citizen Journalism and Tomorrow's Journalists," *Journalism*, vol. 14, no. 8, 2013, pp. 1076-1090.

⑩ Schudson, M.,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p. 3-11.

⑪ 李红涛:《黄金年代的“十字路口”:〈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中国传媒报告》2013年第4期。

⑫ Boodana, S., "A Definition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as a Performanc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 33, no. 3, 2011, pp. 385-398.

⑬ Wahl-Jorgensen, K., "The 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 A Case Study of Pulitzer Prize-winning Articles," *Journalism*, vol. 14, no. 1, 2013, pp. 129-145.

⑭ Wahl-Jorgensen, K., & Pantti, M., "Introduction: The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vol. 22, no. 5, 2021, pp. 1147-1154.

⑮ Peters, C., "Emotion Aside or Emotional Side? Crafting an 'Experience of Involvement' in the News," *Journalism*, vol. 12, no. 3, 2011, pp. 297-316.

⑯ Hackett, R., & Zhao, Y.,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Toronto: Garamond Press, 1998, pp. 53-54; Schudson, M., "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vol. 2, no. 2, pp. 149-170; Ward, S. J. A., *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 Ethics: The Path to Objectivity and Beyo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72–174; Örnebring, H., "Tabloid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abloid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vol. 5, no. 3, 2004, pp. 283–295.

①7 Collin Sparks, "Introduction: The Panic over Tabloid News," in Collin Sparks, & John Tulloch, eds., *Tabloid Tales: Global Debates over Media Standards*,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pp. 1–40.

①8 Matt Carlson, "Introduction: The Many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in Matt Carlson, & Seth Lewis, eds.,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15, pp. 1–18.

①9 Usher, N., *Making News at The New York Tim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4, pp. 1–29.

②0 Ward, S. J. A., *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 Ethics: The Path to Objectivity and Beyo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8.

②1 Carlson, M.,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 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26, no. 4, 2016, pp. 349–368.

②2 Peters, C., "Emotion Aside or Emotional Side? Crafting an 'Experience of Involvement' in the News," *Journalism*, vol. 12, no. 3, 2011, pp. 297–316.

②3 Coward, R., *Speaking Personally: The Rise of Subjective and Confessional Journ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93–107.

②4 Mia Lindgren, "Autoethnographic Journalism: Subjectivity and Emotionality in Audio Storytelling," in Nicholas Monk, Mia Lindgren, Sarah McDonald, & Sarah Pasfield–Neofitou, eds.,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New York: Springer, 2017, pp. 183–206.

②5 Stanyer, J., *Intimate Politics: Publicity, Privacy and the Personal Lives of Politicians in Media Saturated Democrac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②6 Wahl–Jorgensen, K., "An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 Studies?" *Digital Journalism*, vol. 8, no. 2, 2020, pp. 175–194.

②7 Peters, C., "Emotion Aside or Emotional Side? Crafting an 'Experience of Involvement' in the News," *Journalism*, vol. 12, no. 3, 2011, pp. 297–316.

②8 Ward, S. J. A., *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 Ethics: The Path to Objectivity and Beyon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72–174.

②9 Dennis, J., & Sampaio–Dias, S., "Tell the Story as You'd Tell It to Your Friends in a Pub': Emotional Storytelling in Election Reporting by BuzzFeed News and Vice News," *Journalism Studies*, vol. 22, no. 12, 2021, pp. 1608–1626.

③0 Otto, L., Glogger, I., & Boukes, M., "The Softening of Journalistic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Model of Sensationalism, Soft News, Infotainment, and Tabloid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 27, no. 2, 2017, pp. 136–155.

③1 Papacharissi, Z.,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

③2 Pantti, M., & Wahl–Jorgensen, K., "Journalism and Emotional Work," *Journalism Studies*, vol. 22, no. 12, 2021, pp. 1567–1573.

③3 Barbalet, J. M.,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Macro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

③4 Hochschild, A. R., "Emotion Work, 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5, no. 3, 1979, pp. 551–575.

③5 Pantti, M., "The Value of Emotion: An Examination of Television Journalists' Notions on Emotion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5, no. 2, 2010, pp. 168–181.

③6 Richards, B., *Emotional Governance: Politics, Media and Terro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83–84; Barry Richards, "News and the Emotional Public Sphere," in Stuart Allan,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News and Journalism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301–311.

③7 Zelizer, B.,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London: SAGE, 2004, p. 162.

③8 袁光锋:《情感何以亲近新闻业:情感与新闻客观性关系新论》,《现代传播》2017年第10期。

③9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7–11页。

④0 卞冬磊:《伟大的情感:近代报刊的“祖国”话语与意义争夺》,《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2期;唐小兵:《战争、苦难与新闻——试论抗战时期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8期。

④1 Zhongdang Pan, & Ye Lu,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210–231.

④Schudson, M.,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p. 7-9.

④ Zhongdang Pan, & Ye Lu,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210-231.

④[美]威廉·雷迪:《情感研究指南》,周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3-82页。

④成伯清:《情感、叙事与修辞——社会理论的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④看台海:《守望相助 他们在融入中收获肯定和感动》,2022年4月13日, <https://mp.weixin.qq.com/s/mpH2bFD04P0XEW8AYflfxw>, 2023年4月15日;商丘广播电视台文体科教频道:《抗击疫情,守望相助!感动在你我心间!》,2020年2月2日, https://mp.weixin.qq.com/s/EK_65KGnvnRLCAqtF91H6g, 2023年4月15日;湛江日报:《风雨中,湛江这些守望相助的暖心瞬间,令人动容!》,2022年8月25日, <https://mp.weixin.qq.com/s/xVQAcFo10nJG9Yk30iqjMA>, 2023年4月15日。

④CCTV 国家记忆:《国家荣光 谢晋元 | 80多年前,他曾指挥“八百壮士”浴血奋战,誓死守卫上海最后一块阵地》,2020年4月13日, <https://mp.weixin.qq.com/s/-oiLXN5816R9Dxb6Lp3rLA>, 2023年4月14日;海峡新干线:《追思牺牲英烈,重温抗战历史 马英九:我们中国的抗战贡献非常大》,2023年4月5日, <https://mp.weixin.qq.com/s/blcXncTllqbQ5lSlGxbmag>, 2023年4月15日;新民周刊:《军事 | 这位九旬老人,70年前为解放上海浴血奋战三天三夜》,2019年5月20日, <https://mp.weixin.qq.com/s/YRbwNBCrjEi45VOzc9oLg>, 2023年4月15日。

④凤凰 WEEKLY:《运动员与志愿者双向奔赴!中美“00后”在北京冬奥会传递感动》,2022年2月10日, https://mp.weixin.qq.com/s/8jsmtA4_M_k0c0-5Ba9_g, 2023年4月15日;山西文体生活频道:《回顾2022年令人感动的体育瞬间,让人热泪盈眶!》,2022年12月23日, <https://mp.weixin.qq.com/s/BVWj2EkvwOWcTXD5ZLoXlQ>, 2023年4月15日;体坛周报:《那些年,中国体育带给人们的感动瞬间》,2019年10月1日, <https://mp.weixin.qq.com/s/SaRdPILfAbr4CZn5G-Nlkw>, 2023年4月15日。

④解放军报:《荐读 | 他叫邓清明,备份20年未能飞天,却深深感动了我》,2018年1月26日, <https://mp.weixin.qq.com/s/GSjZ5P47VP7TB55fpAjUCA>, 2023年4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卫国飞天,托举有我:回望中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一家子 | 深读》,2022年12月29日, <https://mp.weixin.qq.com/s/qNiQnntYXeUUaWUGUJz8rg>, 2023年4月15日;央视新闻:《他57岁再飞天,一个细节让人感动!》,2021年6月19日, <https://mp.weixin.qq.com/s/IES9Elc47SzAmNFNGDm8eg>, 2023年4月15日。

⑤新浪网:《“最美妈妈”吴菊萍》, <http://news.sina.com.cn/z/zuimeimama/>, 2023年4月15日;永康电台:《致敬!永康消防“最美逆行者”:火海中救出8人》,2018年5月8日, <https://mp.weixin.qq.com/s/BolZ-67rOUFGaAfjoRKR2Q>, 2023年4月15日。

⑤厦门广电:《感动!厦门一女子生命垂危,丈夫做的这件事令人泪目…》,2021年7月3日, <https://mp.weixin.qq.com/s/NH9WATZdiPrCmSmPTWaxqQ>, 2023年4月15日。

⑤大邵网:《感动全网!邵阳一男子背81岁母亲在贵州旅行!》,2021年3月11日, <https://mp.weixin.qq.com/s/rrBsKNldXkIkKv03rV9a4w>, 2023年4月15日。

⑤麦尚文:《仪式传播视野中的“媒介庆典”——以 CCTV〈感动中国〉节目为例》,《现代传播》2010年第4期。

⑤陈卫亮:《“国家价值观的个人呈现”——对央视“感动中国”栏目的解读》,《新闻记者》2011年第7期;麦尚文:《价值传播与社会认同——〈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价值呈现与传播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5期;曾庆香:《论文化公民身份及其建构——以〈感动中国〉、北京奥运开幕式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5期。

⑤陈雪虎:《品牌是怎样铸就的?——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成功经验感悟》,《新闻记者》2008年第8期;欧阳国忠:《精心策划 成就精彩作品——析〈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的成功运作》,《电视研究》2004年第3期;贡振国、陈祖强:《流泪的采访 激情的报道——洪战辉感动中国报道的前前后后》,《新闻记者》2006年第2期。

⑤王庆节:《道德感动与伦理意识的起点》,《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⑤张志安、冉桢:《互联网平台与情感研究:理论路径与本土框架》,《新闻大学》2022年第12期。